



《楚辞》

与中古文献考说

力之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

力之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 力之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5. 12
ISBN 7-80659-801-4

I. 楚... II. 刘... III. ①楚辞—文学研究—文集
②古文献学—中国—中古—文集 IV. ①I207.22-53
②G256.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8410 号

《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

力之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封面设计	文小牛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85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公司(028)85651045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14.375
字 数	340 千字
书 号	ISBN 7-80659-801-4/I·252
定 价	3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序

毛 庆

力之兄与我学术交往有年，是老朋友了。他的第一本文集将于最近出版，嘱我作一小序，接到来信，不禁有点惶恐，因我虽痴长他几岁，然要在书首对他的研究评个子丑寅卯，实在不够资格。但力之兄言辞真切，无一点虚委之意，况且自己毕竟学研楚辞多年，若说拜读文集后的体会，多少也会有一点，将此作学习心得，大概还可以，于是便承命援笔。

文集名《〈楚辞〉与中古文献考说》，分《〈楚辞〉考说》与《中古文献考说》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之楚辞论文，有多篇以前读过，当时因是单篇分散阅读，只觉得是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并未注意到其中之联系。现集中再次学读，便发现有整体构想存乎其间，最明显的是，第一篇——《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为整个《〈楚辞〉考说》之核心和基础：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入，而东方

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篇；以至宋玉所作，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考察可知：《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第1页）

刘向纂集《楚辞》一书之旨，前人多注意其文体特点，以为凡其认为属楚辞体者即录入，虽然王逸于《楚辞章句》各篇之小序中，已隐约暗示各篇之旨是“代屈原设言”，但后来学者——尤其是近现代学者——多有忽视，以致出现一些误解。曾有学者认为宋玉作品除《九辩》外，其余均不可靠，理由之一便是刘向《楚辞》未收（《招魂》之著作权尚有争论）；也有学者认为司马相如作品全无楚辞体，东方朔作品除《七谏》外亦如此……为澄清此类迷雾，力之对《楚辞》中非屈原作品详作考证，得出上述结论，辨析精准，论断的当。其中《九辩》一篇虽略欠全面，然亦能言之成理。而一旦核心之论成立，基础立稳，便犹如高屋建瓴，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如：目录学上《楚辞》为何独立为类？《汉志》何以不著录《楚辞》？《卜居》《渔父》是否为屈原所作？等等。

《〈楚辞〉考说》其余各篇间，也互有引证、印证，互相钩连，如《〈远游〉考辨》一文考《远游》为屈原所作，其考辨材料及结论支持了《〈远游〉〈惜誓〉均非唐勒所作辨》一文之论点；《〈九辩〉考辨》与《〈宋玉作招隐士考辨〉驳议》二文互有联系，甚至互为因果……这样，当你阅读其中某篇论文时，表面上是在看一篇文章，实际却是面对一个系统，而这个系统又是精

心构建、逻辑严密、材料详实的。由此，可见作者认真谨严的科学态度和学术精神。

当然，仅凭态度认真谨严还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全面扎实的专业基础，即学界常说的功力。从事文学文献研究工作的学者，必须具有版本、目录、训诂、文字、音韵、历史文献等等学问的基础，而力之这方面的功力，是学界公认的。这功底在《考说》中也可说是处处显现出来。从《楚辞学三题》《总集之祖辨》等可看出他的目录学基础，从《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文选〉李注札记》等可知他在训诂学上下了大功夫，从《〈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说略》《〈史记〉〈汉书〉〈后汉书〉注札记》等可发现他掌握史料的能力，从《〈九辩〉考辨》《关于〈诗品序〉与〈诗品〉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等可观察到他对文学史料“文学”性之重视……

正因为力之具有如此扎实的功底，他才能在《考说》中指出诸多前代学者尤其是著名学者之误。他指出朱熹将贾谊的《吊屈原》《服赋》二文收入《楚辞集注》是乱了《楚辞》之体（第17—21页）；指出纪昀对《楚辞》在目录学上独立为一类所提供的理由，“不成理由”；指出“章氏（章学诚）与馆臣一样，仅从文体之异着眼，故其执此责《七录》与《隋志》以《楚辞》独立为一类，乃为知二五而未知一十”（第14—15页）。还指出《文选》李善注中十条“张冠李戴”的错误（第382—385页），以及《艺文类聚》的“缺失与窜乱”“次序混乱”“引文之失”“引文中本非问题的问题”“以正文概序与以史氏语为序”五大错讹（《〈艺文类聚〉的问题种种》）。初见论题与标题，着实为他捏了一把汗，倒不是以为前代名家无错可纠，而是名家错误毕竟较少，其

著作高标鹄的，又问世了几百上千年，其间不知多少学者辨析校，订正指误，还能留下多少错处让后人来纠正？如若炒前人之“冷饭”，或不能补前人未举之重要材料，岂不是毫无意义？及至细细拜读，方松一口气，所指诸条，不仅举证翔实，有理有据，而且据笔者之浅见薄识，确实是前人或误见、或未觉、或漏检、或罅缺的。

楚辞学有两千多年历史，若说其成规模、成系统的文献研究是从宋代开始，那也有一千多年了。楚辞文献中绝大多数问题均被提出过、研究过。进入现当代，这些问题又被拿出或挖掘出来再三再四、翻来覆去地讨论，任何希望对楚辞文献进行研究之学者，与人争论必不可免，力之自然也如此。《考说》中第一部分，几乎篇文章都要与人辩论，与老一辈学者辩，与中年学者辩，甚至与年轻的学者辩。此处当然不可能、笔者也无此能力对争辩之具体结论一一作出评述，而觉得总体上值得肯定的至少有两点。

以谭氏功底之厚实而有是失，根本在其做法本身：仅凭一“报友短札”之持论与一长赋所说“相同”，而无任何坚确之证，便轻率地断两者出于一手。可以说，这是十无一得的。屈作《远游》被凭虚否定之后，以此例之，认为汉人作者，你可以拿之与《淮南子》《鹏鸟赋》和《楚辞》中之《哀时命》《惜誓》《七谏》《九叹》等比较，这些作品（著作）中之任何一篇（部），其同于《远游》者，均多于班嗣此“报友短札”；而认为是先秦作品，你亦可以拿它与《老子》《庄子》《吕氏春秋》《文子》等比，而说两者“相同”；

或以之与《九辩》《论义御》比而找出彼此的若干共同点。
(第 93—94 页)

这段文字是针对谭介甫先生考定《远游》为两汉之际的班嗣所作而发，具体考辨可见集中《〈远游〉考辨》一文。在《远游》著作权问题上，笔者意见并不与力之相同（他认定为屈原作），但力之在上引文字中所坚持的审慎谨严、全面引证之研究作风，是笔者十分赞同的。如今学风浮躁，据其一点不及其余或有意“遗漏”其余的所谓考据文章，比比皆是；由此推出的新论、异论、怪论，在在皆有。力之指出谭先生之失不在功底而在做法，实际也是在批评当下浮躁之学风。

第二点在于与人商榷的态度，虽不敢说时时处处都可肯定绝大多数时候是真切诚恳的，绝不搞人身攻击。譬如：《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一文之结尾云：“于此，尽管我们不同意蒋、林两先生的看法，然而对他们为在更坚实的层面上求是的勇气、努力与真诚，表示深深的敬意”；《〈远游〉〈惜誓〉均非唐勒所作辨》之开头与结尾云：“‘《远游》为唐勒所作’说，出自当代‘楚辞学’名家赵逵夫先生”，“于此，我们虽不同意赵逵夫先生之说，然对赵先生的大胆创新、勇于探索的精神与为在更高层次上求真的热诚，深怀敬佩。笔者明于知人之微瑕，而暗于识己之大失，故祈赵先生与海内外的方家不吝教之云”。如此诚挚的论辩态度，如此对论辩对手探索精神的肯定，以我对维纯、逵夫二人的了解（维纯上世纪 90 年代去了美国，蒋先生已故世），他们是绝对欢迎而不会心存芥蒂的。刘勰曰：“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

这种“不得已”，我相信学界同行们都有所体会。因而，好辩绝不是坏事，只要态度正确，它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肯定是好事。

关于第二部分，几篇《文心雕龙》的论文使我颇感兴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为何不论及陶渊明？此为千古聚讼之案，历来名家发表了各种看法，《考说》中亦有两篇议此。力之不同意现当代著名《文心雕龙》专家刘永济、杨明照之观点，并认为著名学者敏泽、王运熙、周振甫的观点因同于杨氏而“似未得其实”，反而赞同湛之、郭预衡、王达津三先生之说，且以详实的考证支持之：“即《文心雕龙》以东晋末年为封域，入宋者概不及之，而陶渊明入宋。谢灵运所以得不到刘勰具体之评说，亦当如是观。”（第303页）详阅二文，笔者认为力之所说有据有理。记得20世纪70年代末，著名的《文心雕龙》专家吴林伯先生给我们开《文心雕龙》研究课时，也是持此观点，好像吴先生未有公开刊布，现想起不免为一憾事。另两篇论文，一议《文心雕龙》不论当代的问题，另一则议《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之真伪。《隐秀》补文之伪已成定论，而张戒补的两句是真是伪则始终有异见。力之从版本学角度详作考辨，对前者补充了材料，对后者认定为改写而无实质性文献价值，不过还是有参考意义。以我所知，力之对《文心雕龙》好像并未定为学术专攻，然其所下的功夫即令专攻者恐怕也会给以高度肯定。

写到这里，文已长了，不过还想再啰嗦两句。如今，学术职业化已成时代趋势，恐怕谁也阻挡不了。而我辈是反对学术职业化的：教书可以也应当职业化，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副教授、讲师，都可按教师职业的种种规范来要求、考核；但现在是以职业的量化方法来考核学术，并以职业化的学术考核来衡定大学教师

水平之高低且给予相应之待遇，这就搞反了，如此反向运作带来的种种弊病学界是有目共睹的。我辈人微言轻，对之只能干喊两声而无可奈何。然而我辈可以保持一份清醒，在按宇宙生存法则与世推移、掘泥扬波中留有自己的一块“自留地”，随时提醒自己——“本来……”、应该如何如何。力之兄是有这份清醒的，他几次说“把对学问的追求当作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很高的境界了！有这样的高境界是用不着任何考核也会出更高更新的学术硕果的！我深信这点。

目 录

序	毛 庆 (1)
---------	-----------

《楚辞》考说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3)
楚辞学三题	(16)
《楚辞》研究二题	(28)
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	(35)
《文选》骚类李善注引《楚辞章句》小序均非原貌辨	(63)
论以他称写己与自我称扬	(78)
《远游》考辨	(88)
《远游》《惜誓》均非唐勒所作辨	(102)
《卜居》《渔父》作者考辨	(122)
《九辩》考辨	(132)
《招魂》考辨	(144)
《〈招魂〉考辨》补说	(156)
《宋玉作〈招隐士〉考辨》驳议	(170)

“受屈为客卿”之“客”为王逸注原有辨	(181)
王逸释《涉江》的“伍子”为“伍子胥”无误辨	(185)
关于“骚”“赋”之同异问题	(197)

试论赋之范围与汉赋“序文”之作者问题	(212)
关于《七月》之作者问题	(227)

中古文献考说

《史记》引文札记与后世引文问题说略	(247)
《史记》《汉书》《后汉书》注札记	(264)
说范晔《后汉书》之“志”	(279)
《文心雕龙》不提陶渊明乃因渊明入宋辨	(286)
关于《文心雕龙》论文不及陶渊明之问题	(293)
《文心雕龙》论文不及当代乃因其“讹”不称于“休明”辨	(309)
《文心雕龙·隐秀篇》补文之真伪辨	(317)
关于《诗品序》与《诗品》价值取向的差异问题	(333)
《闲情赋》之评价种种	(347)
《文选·长门赋》为司马相如作无疑辨	(361)
总集之祖辨	(376)
《文选》李注札记(一)	(388)
《艺文类聚》的问题种种	(393)
《艺文类聚》刊误(一)	(411)
附录一 建构宜 考辨精 系年详	(435)
附录二 前辈书三通	(443)
后 记	(446)

《楚辞》考说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 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摘 要：《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入，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篇；以至宋玉所作，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考察可知：《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楚辞》一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屈原集”。它收录了屈原的全部作品，而所选录的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这一点，《楚辞章句》几已“班班显言”。近代某些学人忽乎此，或曰：《文选》所载的宋玉赋为伪作，不然当见于《楚辞》。而辩之者则曰：赋与骚别。其实，两说皆非。事实上，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对楚王问》与《卜居》《渔父》并没有什么不同。故《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始造‘对问’”下，纪昀评曰：“《卜

居》《渔父》已先是‘对问’，但未标对问之名耳。”^①又，元代祝尧《古赋辨体》云：“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辈述之，至汉此体遂盛。”^②《四库全书总目》卷188《〈古赋辨体〉提要》称此“于正变源流，亦言之最确”。可见，《九辩》《招魂》以外的其他宋玉作品不得入《楚辞》，关键不在“赋与骚别”；而“或曰”之不能成立，不言而喻。此外，从班固《离骚序》、王逸《楚辞章句序》及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等中可以看出，影响西汉辞赋者，莫巨于屈原作品。而刘向最后编定的《楚辞》一书^③，西汉的仅录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及他本人共六家各一篇，其时最大的赋家司马相如亦莫得与焉。(朱熹《楚辞后语》卷2《〈哀二世赋〉题解》认为《上林》《子虚》之作，“以夸丽而不得入于《楚辞》”，非为知言。)至于所录各家，其入选之作，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如东方朔之作，《汉书》本传以《答客难》(与《渔父》体同^④)与《非有先生论》为“最善”，而此两文均不在《楚辞》域中。那么，非屈作被选入《楚辞》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呢？我们研究所得是：代屈原设言。(《九辩》《招魂》以外之宋玉作品、司马相如之全部赋作和东方朔“最善”之“文辞”，均非此类；贾谊之名作《吊屈原赋》中之“我”，亦非“屈原”；故

① 《文心雕龙辑注》(黄叔琳注，纪昀评)，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36页。

② 卷三“《子虚赋》”题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后引《四库全书》，均此本)。

③ 《楚辞》为刘向所集无可疑，详拙作《〈楚辞〉研究二题》，见《云梦学刊》1999年第1期。

④ 余嘉锡《古籍校读法·明体例·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设论”条：“《答客难》其体本是杂文，源出于屈原之《渔父》、宋玉之《对问》。”

均不为《楚辞》所收。)今分说如下:

先说《七谏》《九怀》《九叹》及《九思》四篇 王逸序^①《七谏》云“东方朔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七谏》云“平生于国兮”，“余将谁告”（《初放》）；“苦众人之妒予”（《沈江》）；“惜予年之未央”（《自悲》）；“我决死而不生兮，虽重追吾何及”（《哀命》）。这里，“余（予、我）”为“屈原”，而非作者之自“余”。王逸序《九怀》云：“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渌，遭世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九怀》云：“余深愍兮惨怛……念君兮不忘（王注：“思慕怀王。”）。怫郁兮莫陈，永怀兮内伤。”（《匡机》）又云：“迎余兮欢欣，顾念兮旧都”（王注：“还视楚国，思郢城也。”《尊嘉》）；“余惆怅兮何归？……悲九州兮靡君”（王注：“伤今天下无圣主也。”《陶壅》）。按：因代屈原设言，故可说“九州靡君”。王逸序《九叹》云：“向以博古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九叹》云：“云余肇祖于高阳兮，惟楚怀之婣连”；“思南郢之旧俗兮，肠一夕而九运”（王注：“言己思念郢都邑里故俗……欲还归也。”《逢纷》）。又云：“悲余心之惓惓兮，哀故邦之逢殃。辞九年而不复兮，独茕茕而南行。”（《忧苦》）又云：“回朕车俾西引兮，褰虹旗于玉门。”（《远游》）按：因代屈原设言，故可自称为

① 《楚辞章句》各篇之“序文”均王逸所作，详拙作《关于〈楚辞章句〉“序文”的作者问题》。